

# 经济研究十二篇

平新乔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研究十二篇 /平新乔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10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ISBN 7-301-07901-X

I. 经... II. 平... III. 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文集 IV. F1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5149 号

书 名:经济研究十二篇

著作责任者:平新乔 著

责任编辑:任旭华

标准书号:ISBN 7-301-07901-X/F·093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em@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926

排 版 者: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13.375 印张 219 千字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系列

## 总 序

自 1776 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经济学脱离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以来,研习者日众,影响日远,已经蔚然成为社会学科中的显学。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一个简单的逻辑体系,和任何其他社会学科的理论一样,经济理论来自于对人类社会经济现象的观察和总结,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创新,经济学的理论也必须不断经受各种过去的和新发生的现实经济现象的检验,才能去芜存菁,知道何者可以暂时被接受、何者应该存疑或是被摒弃。从上述角度来说,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进行的改革开放对当前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挑战:不管是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明晰产权、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资源配置和流通领域的双轨制,这些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及其所伴随的问题,有不少是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所不曾预料到,也难以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的现象。但是任何经济现象背后总有产生这个现象的逻辑,对于不能用现有的经济理论解释的现象总可以构建新的理论来解释。因此,中国的改革开放给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提供了一个大好的机会,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金矿。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渐建立和完善,当代经济学在我国的影响也是方兴未艾。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实的社会经济现象,进而运用理论、制定政策、改造社会,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随着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各种矛盾和利益交织在一起,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面对一个问题,何者为因?何者为果?推行一项改革措施对激励机制、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局部和整体上会产生什么影响?要是没有合适的理论作为分析工具,那就很难认识清楚,制定的政策不仅难以对症下药,而且还可能制造出更多新的问题。所以,根据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创新,不但

此为了对当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作贡献,也是为了推动中国改革和发展的



顺利进行,对此,中国经济学家责无旁贷。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10 年前在北京大学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由我和几位接受过完整经济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回国创立。虽然在国外工作可以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和丰厚的薪酬,然而,国内改革开放在经济理论研究上提供的机会吸引着我们,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型过程中对理论创新的需求也激励着我们。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新体制、新理念聚集一群有理想、有热情、学有专长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经济学的教育、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以及国家的现代化奉献一点力量。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 10 年来,研究人员从创立之初的 6 位增加到现在的 24 位,已经成为国内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基地。这 10 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许多研究人员深入农村、企业等基层改革的第一线作了大量的调研,也参加了不少政府高层的政策研究和讨论,形成了许许多多分量、有鲜明观点、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和政策报告。这些研究对我国的农村、国企、金融、财政、外贸、电信等领域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 10 年间,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还利用和国内外学术机构联系较密切的优势,邀请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讲学和参加会议,深入探讨了金融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城乡收入分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等我国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积累了许多简报和论文。这次,借 10 周年庆祝之际,在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中心的简报、讨论稿等整理、汇编成册,作为一个系列出版。一方面,以此向关心、支持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各界领导汇报这 10 年来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以此求教于海内外学界的专家,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学者来关心、研究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

就中国的历史长河而言,10 年只是一瞬,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所提供的研究机会以及需要在理论上解决的问题而言,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 10 年来的工作也只是沧海之一粟。展望未来,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所有人员将会秉持 10 年前中心成立的初衷,和海内外学界的朋友携起手来为中国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而努力!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迎来中华民族在 21 世纪伟大复兴,也一定会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

林毅夫

2004 年 9 月

## 自序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之际,组织教师出文集,我从自己百余篇论文中选出这12篇汇成一书。取名为《经济研究十二篇》,是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它们基本上(除一篇以外)都发表在《经济研究》上,二是它们基本上反映了自己在过去几十年中学习经济学的思考轨迹。

我很幸运,在过去30多年的生涯中,每一个10年的前几年,我都遇见过名师,密集地读过几年书。20世纪70年代初是在上海,80年代初是在北大,90年代则是在美国。每个密集读书的训练期都会持续影响我的工作与生活达10年,我的眼界也由此依次打开,经历过三种境界。这三种境界之间的演化与转变,既有时代变化之推动,也是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之结果。每上一个台阶,还来不及自我平衡一下,新的挑战就接踵而来,将我推入谷底,重新攀登新的高峰。经历是我真正的大学,从中慢慢体味到“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只有顺天者,才可能天助之。何谓“天”?乃世界进步之大势也。

我的第一个求学平台是《资本论》,授课老师漆琪生、谢焕法、宋承先等已先后谢世。那是极“左”年月,可教授们的敬业态度至今仍存留我心。1972年的漆琪生已年近七旬,且患有眼疾。他每周给我们授两次课,每次整整一个半天,中间只休息一回。半天课的讲稿需万把字,每次课前都打印好发给我们。这样算来,漆先生每周光写讲义就得两万字,并且每周要授一整天课。30年过去,年届50的我早已体味过授半天课后的身心疲惫,不禁会想:如果还要在这种疲惫后每周写出两万字,并且这副重担是由一个近70岁的老人来挑,必会承受很大的艰苦与辛劳。至今回想起来,敬佩之情尤胜当年。但就是这种《资本论》单课独进、旁无他骛的集中并扎实的学术训练,让我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之路。几十年风云变幻如烟消散,但《资本论》中的经典阐述论证,至今仍受用。漆琪生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的学生,是农业、土地问题的专家。时隔32年,2004年春,当我们讨论中国土地开发与城市征地问题时,还离不开绝对地租与级差地



租之框架,这时便会浮现漆先生授课的身影。

第二个学习平台是8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我幸运地承教于陈岱孙、厉以宁教授门下,随后又成为胡代光教授的学生。那是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全盛时期,除上述三位先生外,陈振汉、杜度、范家骧教授等都为我们开出现代经济学精品课程,那是真正的精品。厉以宁先生给我教诲甚多,其中最为深刻并历20年之久还影响着我的是入学不久他口授的“六字真经”,即学经济学需“理论、历史、统计”。厉老师告我,这六字真经来自于熊彼特。但对我而言,是在陈岱孙、厉以宁的引导下,才将这六个字化为在几十门功课中的点滴努力,逐步建立起一个经济学者观察社会的坐标系与感觉。

北大的两年半研究生密集学习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由此我才可能跨上第三个平台,并能坚持完成在美国的经济学博士学业。北大的学术训练培养了我三方面的能力,一是学会了写学术文献综述,外国经济思想史的专业训练就在于此;二是初步学习了经济分析必备的数学、统计工具;三是跟随厉以宁教授开始参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知不觉之中找到了最抽象的经济学概念、数学公式与具体的经济现象之间的某些对应关系,仿佛是“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这种感觉十分美妙。

90年代在美国的学习,让我知道了经济学的山有多高,水有多深。我看到了理论经济学家原来“可上九天揽月”,而做实证的经济学家则具备“可下五洋捉鳖”的本事。一个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能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提炼出一种思维激光,将现实经济关系化为线条分明的透视结构。而做实证的人,就像一个高超的侦探,最后能从杂乱无章的一大堆数据中找出关键证据,证实或证伪先人的猜测,提升人类对经济关系的认识。我为当代经济学在这两方面的成就所深深叹服,但由于资质鲁钝、起步也晚,虽然竭尽全力,至今只学到皮毛。因此,到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这次组织出个人文集时,我诚惶诚恐,勉为其难。

\* \* \*

本书所汇集的12篇文章都属于应用微观经济学领域,这也是我近20年教学与研究的主要方向,论文所讨论的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市场竞争。这当中有些并不是我个人的成果,有两篇是与刘伟合著,一篇与蒋国荣合作,还有三篇的写作,我的学生魏军锋、郝朝艳、范瑛、李自然也参与其中。这些论文大体上表达了我对中国企业改革与市场竞争的观点,实质上是我学习微观经济学的若干心得。

最早让我对产权问题产生兴趣,还是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读了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由常燕生译出的《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本书介绍的科斯、贝克尔、诺思等人,10年内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则成了当时我思考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思想来源。从传统的经济学转向现代经济学思维,阅读科斯是一个自然的过渡。这是由于科斯的方法与传统的制度经济学是一致的,我们在以往的训练基础上比较容易接受科斯的思考方式。另一方面,科斯所提出的问题又是相当深刻的:企业的性质是什么?这令当今最前卫的微观经济学家都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在过去的20年内,国外最现代的企业理论在科斯的基础上,分别强调了契约的不完全性(Grossman and Hart,1986)、代理问题(Jesen and Meckling,1976)、任务安排与分派(Holmstrom and Milgrom,1994)、财产所有权(Hart and Moor,1990)、权威与控制权的配置(Aghion and Bolton,1992;Aghion and Tirole,1997)以及在企业组织中人力资本产权的地位(Zingales,2000),这些都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企业内部组织架构的认识。然而,企业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设计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的各类控制权应该如何配置?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理论界仍在探索过程中。这种探索,从根本上来说,反映的是现代公司企业在信息革命时代随市场交易方式与信息沟通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的企业组织方式的演化,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组织形式也处于日益变化之中,更何况中国?

对企业性质的认识以及与此相关的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组织理论与治理结构理论,只是现代微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侧面。在过去20年中,微观经济学还在另一个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即一向被视为是天然垄断的产业性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竞争,正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渗入到原来基于规模报酬递增而被视为自然垄断的领域,如电信、电力、邮政、航空、铁路、城市公用设施等。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认为,由于这些部门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平均成本线是向右下倾斜的,边际成本曲线便一直处于平均成本线之下,如要实行边际成本定价规则,企业必定亏损。因此,对这类产业,出路只有两个:或者是企业国有化,或者是由政府规制私人垄断企业,凭价格听证制度等方式来限价。这便是西方规制制度与国有化的理论基础。

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生产关系也悄然发生变化,一场解除规制的革命已席卷西方国家,经济学上也随之提出了种种解除规制的理论。可竞争性理论(Baumol and Willig,



1982)指出,开放原来垄断的行业,允许潜在进入者拥有自由进入的权力,在政府不干预的条件下,所谓天然垄断的行业如民航业,也会趋近于竞争性定价。内生的研发与广告投入决策理论(Sutton,1991,1998)证明了,所谓进入壁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外生变量,在企业与产业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它们都是内生的,这说明产业的垄断性也是可变的。电信竞争理论(Laffont and Tirole,1998,2000)与电力竞争理论(Joskow and Tirole,2000,2004)的提出,都从理论上支持竞争性改革,批评交叉补贴、现期电力市场价格加成、电力配置过程中的非价格配额条例等等。

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企业理论)与竞争理论在过去1/4世纪里的最新进展,实质上是我们这个时代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变革在理论上的反映。这种影响是全球性的,当然也影响中国。事实上,贯穿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两个主题一直是企业改革与市场竞争机制的建设。有时这两个主题似乎有冲突,从事改革的理论工作者之间会偏重于其中一个主题而与强调另一个主题的另一方发生争论,从而产生“厉股份”与“吴市场”之间的所谓争论,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两个主题是相辅相成的。企业改革与市场竞争的互动,乃是过去20多年里中国走向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这是由于,传统的经济体制是由国有企业加行政计划而构成的,要在行政性的政府垄断、政府管制下改造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与控制权结构,由于缺乏产业管制上的改革,或者会流于形式,或者会让一部分控制权拥有者利用行政垄断而侵吞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事实上,只有在产业背景上引入竞争性的进入者,国营企业的改制才会动真格,而这正是发生于最近7~8年间的事,那是中共中央提出了“抓大放小”方针之后。

\* \* \*

这本论文集就是我对中国经济改革在以上两个微观主题上思考的一些体会。它们涉及三方面的问题。

一是产权与国企改造机制的选择。这主要体现在文集的前两篇里。《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与企业行为分析》是我与刘伟在1987—1988年合作研究的一项成果。在那近两年的合作研究中,我们共同阅读了数百种西方文献,对产权问题作了理论上的比较分析。该文基本上是一个文献综述,尽管在文章中我们否定了工人自治制产权安排,也指出私有企业同样有产权不清晰问题。由于我们当时实际上已认识到公有制企业中存在“产权虚置”现象,在另一篇文章(发表于《中青年经济论坛》1988年第4期)里已有阐述,因此在本文中只是简略提及了“产权虚置”问题。这篇论文是我的研

究起点。

《对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企业承包制的若干思考》的写作起因是商德文教授当时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一书,我有幸写作其中关于税制改革那一章。当时我已在康乃尔大学经济系学习,试着用动态规划改写了 Weitzman(1980)的棘轮效应模型,发现 1992 年中国政府的国企改造方案并未越出行政体制下的垂直承包思路,这种机制的必然趋势是激励效应递减。论文的另一贡献是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税负太重且存在严重的反激励效应。

在接下来的四篇论文里,我实际上是逐个分析了国有企业在运行过程中的行为特征与存在问题,这构成了这本论文集的第二个关注点。我指出了国有企业的银行坏账、“预算软约束”、信息披露中的报假与代理成本问题。

《“三角债”的博弈理论分析》原是我与蒋国荣在康乃尔大学经济系修《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课程的一篇学年论文。经过我改写后,投到《经济研究》得以发表。天则所原所长、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指出,将博弈论引入经济分析,该文在中国是“首开先河”,应“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史上记下一笔”。我们在文中证明了:国企的投资机制是引发坏账的根源,坏账问题在国企垄断条件下存在再发生机制,存在最优坏账的合理规模,财政注资冲销坏账会引发下一轮道德风险。所有这些,都提出于 1993 年。十年后回过头来看,上述论证仍然成立。尽管治理坏账的机制在转向规范的市场机制,但坏账在中国的发生机制仍旧未变,即由政府推动的投资冲动与银行信贷机构对投资项目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企业、银行与政府三者之间协调失灵所导致的坏的纳什均衡,是坏账的实质。

《“预算软约束”的新理论及其计量验证》一文是根据我于 1998 年向康乃尔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的部分章节改写的。我的贡献只在于运用中国 1980—1989 年的国企数据,设计了一套检验“软约束”的计量程序,得到了以下发现:(一)1980 年代中国实行“拨改贷”后,预算软约束问题已从财政软约束转变为银行信贷软约束;(二)中央政府对所属的中央企业的预算约束要“软于”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的预算约束;(三)就业压力是中国国企中存在预算软约束的根本原因之一;(四)沉没成本是预算软约束的根源之一,即预算软约束确实有决策上时间不一致性的原因;(五)国有企业逐渐进入市场后,并未改变预算软约束行为;(六)加强投资的集中度会助长预算软约束。



“预算软约束”只是一种形式的“软”，事实上还存在另一类“软”，叫“软信息”(soft information)。如果说传统的国有企业是依赖于政府财政或国家银行，其问题主要表现为“预算软约束”的话，那么，当国有企业上市，其资金可以从股市上通过直接融资获得之后，则“软信息”就会逐渐上升为其主要问题。所谓“软信息”，就是中介机构或审稽单位披露的信息不是硬的，甚至虚假。我与李自然的论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勾结问题》，对“软信息”的产生进行了理论建模。我们的分析揭示了，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购买独立会计原则”这种事件发生的区间，是稽查概率( $P$ )、惩罚力度( $m$ 与 $n$ )与国家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再融资资格( $t_0$ ，比如净资产收益率要达6%以上)的一个函数。并不是所有的上市公司都会愿意让中介虚报，也并不是所有的中介都愿为上市公司虚报。虚报作为一种纳什均衡，一般会发生在证监会规定的上市公司再融资资格附近的一个小区间内，该区间的下限由中介(会计事务所)来把握，而该区间的上限则由上市公司决定。并且，这个假冒的上市公司的质量信号发生的区间，对于 $t_0$ 来说，并不是对称的，在 $t_0$ (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达6%)以右假冒的区域会大于在 $t_0$ 以左假冒的区域。我们还讨论了信息披露假冒事件对于上市公司质量分布表现形态所发生的歪曲，证明了如果说真实质量落在上市公司再融资资格 $t_0$ 的左右两侧内时，虚假披露便会发生，那么，一经中介机构以 $T^*$ 的形式披露，则 $T^*$ 作假的区间一般发生在 $t_0$ 以右，这进一步锁定了虚假信息发生的分布区间。假报会使会计年报呈现出来的上市公司质量分布相对于真实的质量分布发生均值向右平移，方差收缩变小，这对估算会计报告中包含的有关上市公司质量分布的水分与泡沫，是有意义的。

当然，我们这篇论文并未给出如何克服“软信息”的机制。这涉及到如何给从事信息收集与信息披露的中介机构与稽查机构以必要的激励，实质上要将“委托—代理”的契约关系引申到中介机构中去。Tirole 1986年的论文只分析了中介机构与代理人之间的勾结来欺骗委托人与所有者，而我们的任务则是要完善机制设计，让中介有动力来披露真实信息。光靠惩罚是不够的，一个一味讲惩罚的体制并不是一个好体制。

其实，无论是“软预算”，还是“软信息”，说到底是有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的反映。2001—2003年，我获福特基金会资助，专门从数量上来估算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我运用“2002年国有企业改制调查”中的激励工资数据集，在特定的生产函数和代理人的效用函数的框架内，按 Broyden-

Fletcher-Goldfarb-Shanno 的最大似然估计模拟程序,对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的规模、原因作了估计与分析,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相当于 60%—70% 的利润潜力。这就是说,在现存的国有企业体制下,代理成本使得企业效率只利用了 30%—40%!代理成本由两方面原因而产生,信息不充分与代理人风险规避态度。所有者(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客观随机冲击  $\theta$ 、代理人的行为参数风险规避  $r$  与努力的边际成本递增率  $\eta$  缺乏充分的信息所产生的代理成本占  $2/3$ ,而由代理人风险规避而导致的代理成本占  $1/3$ 。从模拟估算的结果看,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大约可以使利润潜力的利用率增加 20 个百分点。而降低契约的信息成本,从根本上来说,应该在对财产所有与控制权上努力实现分权化。这项研究成果会以另一本专著形式出版,这里发表的,只是投给《经济研究》的以主要结论写成的论文。

这本论文集所关注的第三个重点便是市场竞争以及在竞争格局中“国退民进”的变化趋势以及收敛边界。这是我早在 1994 年夏天在康乃尔大学选博士论文题目时就思考的问题,当时读 K. Basu 的产业组织讲义,写下一个笔记,实质上是一个简单的模型,2000 年 7 月,以《论国有经济比重的内生决定》为题发表于《经济研究》。我设  $\theta$  为国有企业服从政府目标的权数, $\theta=1$  表示国有企业完全服从政府目标, $\theta=0$  表示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一样追逐利润。我证明了对于处于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来说,选择什么样的  $\theta$  值,即在产量决策变量上让政府目标占有多大的权重,实质上是在以企业自身的利润目标为一极,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距离为另一极的两端之间进行权衡, $\theta$  与利润事实上都是国有企业的激励源泉。 $\theta$  不光代表政府目标,而且是政府在资源上对企业支持的象征,是国有企业在市场上扼制私有企业扩张的武器。一旦国有企业选择  $\theta=0$ ,实质上便会失去政府的资源支持,而全力追求利润极大化。而若国有企业不选择  $\theta=0$ ,则事实上就不可能与政府脱钩,也就不可能全心追求利润极大化目标。在决定最优的  $\theta$  与最优产量  $q$  的两阶段的古诺—纳什博弈中,国有企业是先决定自己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theta^*$ ,然后才确定最优的产量水平  $q^*$ 。由反向归纳解出的  $\theta^*$  值,在等边际成本与存在私有企业的前提下,不应为  $\theta^*=0$ 。由此推理,当经济中已经存在追求利润极大化的私人企业时,国有企业即使要追求自身利益极大化,也不应该完全仿效私人企业,因为  $\theta>0$  是有利于国有企业控制市场份额的。在等边际成本与线性的市场需求反函数的条件下,在私有企业可以进入的前提下,撇开技术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的



外资企业的差异与管理上的效率差异不论,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的相对比重不会趋于零,而是趋于一个大于零的值。在等边际成本与线性需求反函数的假设下,我推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合适比重应当是  $1/3$ 。尽管这个结论严重依赖于成本函数与需求函数的假设,但由于粗略说来等边际成本与线性市场需求反函数的设定的合理性很好,因此,在同质产品的框架里,这个  $1/3$  国有经济比例的结论有其合理性。是否正确?我等待实践检验。

《中国汽车工业市场规模和企业数量》一文,只是产业竞争中市场格局研究的一个案例。文章根据 Bresnahan & Reiss(1991)所发展的模型和计量方法,对中国汽车工业的市场规模和企业数量进行回归分析。证实了在汽车产业中同样存在着市场规模和企业数量间的正相关关系,并且从实证的角度衡量了中国汽车工业规模小、企业数量多、投资分散的程度。我们的经济计量分析表明,在当今中国的汽车行业,企业实际数目与理论估算的合理企业数目相吻合,并且单个企业的生产尚未严重受到“最低市场需求量”这一门槛水平制约的省份,只剩下上海、天津和吉林三个省市。这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下一步中国汽车行业的重组、兼并与整合的任务有多么艰巨。当然,我们并没有肯定这种重组、兼并与整合要由政府统一计划或行政命令来完成,以往的历史已经表明,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重组中国汽车工业,是低效的,并且也难以完成。引入进入者,可能会有效得多。这是我下一步要研究的课题之一。

《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流民的考察》是刘伟与我发表于 1989 年春的一篇旧文,但它至今仍没有过时。放在这里,是由于这篇论文也属于广义的产业经济学。20 世纪 80 年代的产业经济学在国内还没有“组织”的概念,只是从产业结构与比重方面有些研究,我们的水平也没有超越这一局限。但我们着重分析的“流民”问题,现在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复杂性上,都大大超过了 15 年以前。我们的贡献在于,指出中国的“流民”既不同于 Lewis 二元结构模型中的流民,又不同于 Todaro 模型中的流民,中国的“流民”没有割断与土地的联系,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流动人口自身的风险,同时对社会来说,也大大降低了遇到随机风险冲击时流民所引发的破坏力。在解决流民的出路方面,我们也不同于 Lewis 与 Todaro 的结论。我们不同意当时盛行的“离土不离乡”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思路,而主张发展大、中型城市,以建立经济开发区的方式来大规模地安置农村流民。同时,我们也预测到,解决中国流民问题势必触动当时城乡隔离的二元体制,主

张改革歧视农民的城市福利补贴制度,开放城市土地与公用设施市场,允许农民准入,改革农村土地税制,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融入非农产业与城市生活。这些主张,在15年后的今天看来,仍有生命力。

本书第四部分由三篇书评组成。对中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我迄今只写过这三篇书评,分别评论了厉以宁、茅于軾、林毅夫的著作。对厉以宁老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时我是作为一个学生读完该书后自然写出来的。现在再看这个书评,我仍清晰地感到,厉以宁老师的基本经济思想在20年前就基本形成。他关于中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中怕冷的见解,关于第二次调节,关于公平也是效率的基本主张,早已写在这本书中了。由此对我的启示是,基本的理论研究,乃是一个学者的生命源泉,是学术价值之所在。

茅于軾是我的校外老师。我写《择优分配原理》的书评时,还不认识他。这篇书评未经任何人授意,只是由于1985年买了该书读后心中叫绝,与张维迎商定,俩人各写一篇书评。后来,张维迎那篇书评发表在《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上,我的这篇书评投向《走向未来》杂志,经梁晓燕女士编辑发表。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一定会酝酿出杰出的经济学家,也许这批经济学家未曾在国际顶尖杂志上发表论文,但他们的工作价值一点也不会逊色于在国外一流大学任教写论文,他们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水平事实上是达到国际标准的。而且,正是由于像茅于軾这样一批睿智的学者在思想理论上的原创性推动,中国经济才逐渐地在向国际标准接近。事实上,茅于軾在《择优分配原理》中所阐述的按土地、劳动、资金的边际贡献(价值)来配置资源的道理,在20年后已转变为中国最高决策机构的决策意识,不管人们承认与否。

对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一书的书评,是我写得最用力的书评,这是由于该书的学术价值很高,写前必须细读原著。林毅夫是一个国际一流的学者,他关于中国农业改革、发展与技术推广的研究是会留在发展经济学历史上的。我在书评中分别评价了他的计量方法、模型设计、数据质量与分析的妥帖性,这都出自内心的钦佩。

\* \* \*

这本文集也凝结着《经济研究》编辑部的朋友们的劳动。《经济研究》见证了新中国经济科学的进展,我是从她50年代的旧刊中认识顾准、孙冶方、马寅初、陈振汉等人的,并发现经济学在中国的辱与荣竟完全与中国经济的衰败与繁荣相互对应。在过去的20年,本人身受《经济研究》编辑部



康宗焜、樊纲、郑红亮三位主任的提携与帮助,为编辑、校对人员的认真而感动。提升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我当继续努力。

今年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届时我也跨进“知天命”的门槛。在我看来,知天命其实就是知自我,明白自己在命运面前的极限,明白自己的定位,明白自己的不足,明白自己的岗位与责任。不必说在国外优秀的经济学家面前,也不必说在中国的前辈如马寅初、孙冶方、薛暮桥面前,就是与同代中国学者相比,我都自叹不如。呈上这本论文集,算是交给陈岱孙先生等老师们的作业,以后争取交出更好一些的文章。

平新乔  
于北大致福轩  
2004.8.20

# 目录

## 自序 \ 1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与企业行为分析 \ 1  
对中国企业所得税改革与企业承包制的若干思考 \ 15

“三角债”的博弈理论分析 \ 26  
“预算软约束”的新理论及其计量验证 \ 48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的勾结问题 \ 79  
中国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的实证研究 \ 102

论国有经济比重的内生决定 \ 130  
中国汽车工业市场规模和企业数量 \ 144  
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流民的考察 \ 165

## 独辟蹊径论运行

——评厉以宁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 179  
社会主义经济需要择优分配  
——读茅于軾的《择优分配原理》 \ 185  
以原创性的研究追求原创性的发现  
——读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 190

# 现代西方产权理论与企业行为分析\*

## 一、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形成与演进

在相当大的意义上可以说,产权问题的提出来自西方学者对正统的后又成为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说的根本缺陷的思考与批判。

正统的竞争性理论模型假定:社会资源配置过程只有一种私有制模型,且市场行为者间的交易界线极为清晰,不存在交易摩擦。因此,在正统微观经济学与标准福利经济学的主要文献中,产权问题的研究完全被忽略了。经济学所关注的只是在既定的私有制财产结构下如何解释市场的作用,如何建立市场行为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模型。

对正统微观经济学和标准福利经济学的这种基本观点,西方部分学者很早就开始了批判性考察,现代产权理论就是在这种批判性考察中形成的。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现代西方产权理论的全部思考和研究是沿着下述思路展开的,即指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并非如标准福利经济学和传统微观经济学所描述的那样完美,实际的市场运行是有缺陷的,这一缺陷集中表现在外在性上,而外在性产生的根源在于企业产权界区含混,由此造成交易过程存在摩擦和障碍,这种摩擦和障碍又会严重影响企业行为和企业资源配置的结果。因此,考察市场行为者的利润最大化行为时,必须把产权列入考察范围,而不能简单地作为既定前提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对由于产权不清所导致的市场缺陷的研究主要归功于科斯(R. Coase)、威廉姆逊(O. Williamson)、斯蒂格勒(G. Stigler)、布坎南(G. Buchanan)和舒尔茨(C. Schultze)等人。

科斯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他一生所致力考察的不是经济运行过程本身(这是正统微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核心问题),而是经济运行背后的财产权利结构,即运行的制度基础(这正是正统理论所忽略

\* 发表于《经济研究》1989年第1期,署名为:刘伟、平新乔。



的)。他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不是数学的、效用主义的边际分析(这正是正统理论所采取的方法),而是典型的制度分析,是通过对某些经济现象的分析来阐述隐含在这些现象背后的经济运行规则和制度基础。<sup>①</sup> 科斯产权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20世纪30年代对正统微观经济学进行批判性思考,指出市场机制运行中存在着摩擦,克服这种摩擦的关键在于制度创新。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科斯在1937年发表于伦敦经济学院学报《经济学家》上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第二个阶段是在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科斯正面论述了产权的经济作用,指出产权的经济功能在于克服外在性,降低社会成本,从而在制度上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斯蒂格勒在概括科斯的的思想之后,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科斯在1960年发表于《法学与经济学杂志》上的《社会成本问题》。

从科斯产权理论的形成来看,产权问题的考察从一开始就是与企业制度的分析相联系的。《企业的性质》一文的本意在于分析企业在市场机制中的地位,力图说明:为什么企业成为市场活动中的基本组织单位?为什么每种要素所有者不是以自己的产品直接参与市场交换,而是把各自的要素组合为企业,然后以企业作为产品的出售者参与市场交易?正是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科斯提出了著名的交易成本概念,而交易成本范畴可以说是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指出,交易成本是运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它至少包含两项内容:(1)发现贴切的价格的成本,即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的成本。显然,科斯的这一思想是直接针对传统的完全竞争理论关于价格信息为既定,并为所有的当事人所掌握的假定的。在科斯看来,价格是不确定的、未知的,要将不确定变为确定,将未知变为已知,企业是要付出代价的。(2)谈判与履约的成本。这同样是针对传统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机制是一种完美的自然秩序的假定的。在科斯看来,市场当事人间是有冲突的,为克服冲突就需要谈判、缔约,并诉诸法律形式,这样,要建立企业间有序的联系就需要支付费用。

30年代科斯之所以提出交易成本范畴,直接目的是论证企业存在的

<sup>①</sup> 科斯的制度分析与加尔布雷思的制度分析有本质的区别。加尔布雷思制度分析的结论是肯定市场机制,而科斯的制度分析则是在探讨市场缺陷的基础上,为克服这些缺陷从而完善市场机制提供理论依据。